照金精神：革命年代凝练出的宝贵财富

□ 王彦军

80年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开启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迎接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是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陕甘边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称其是“落脚点”和“出发点”。

80年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开启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迎接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是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陕甘边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称其是“落脚点”和“出发点”。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照金镇，参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和革命旧址。他指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陕甘边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3年创建的我国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也是全国仅有的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与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铸就了具有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矢志不渝的忠诚精神等特定内涵的照金精神。照金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与党的其他伟大精神一脉相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革命斗争的实践孕育照金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和领导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其中著名的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渭华起义等武装起义；按照党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1932年春，党组织派习仲勋到照金开展工作，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由于照金具有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此时正值年荒，农民流离失所，红二团即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渡过年荒。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5支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产，打开了根据地工作的局面。在主力红军的配合下，游击队武装发展很快。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后张秀山）任政委，统一领导各游击队。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照金苏区的开辟有力地震憾了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恐慌和混乱。同时，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配合支援了陕北、渭北、陕南、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唤起了千万陕甘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的觉悟，鼓舞了西北人民争取解放的勇气和信心。它还是红二十六军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坚强阵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给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配合和支援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当时曾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在创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陕西党组织领导人民为过上有尊严的新生活同中外反动派斗争的战斗历程、精神状态、价值取向、行为操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照金精神。

血与火的洗礼铸就照金精神

在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广大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生命置之脑后，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许多烈士，他们有着优裕的家庭环境，有些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他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放弃了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开展革命运动，并且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仰和甘于牺牲的革命精神。照金苏区现有在册烈士681人，为了这块红色的土地，无数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先烈们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刘志丹、谢子长在创建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尤其是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进监狱，受到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甚至被挖坑活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而是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绝大多数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经受住了战争和政治风雨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不迷航，不动摇，表现出了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

在照金，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出一片红色区域，在一场场血雨腥风、一次次生死斗争中孕育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后来革命大发展积蓄了力量，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推动了周边地区乃至陕北一带的工农武装斗争。照金烽火，这一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使陕甘、陕北连成一片，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了坚实的铺垫。

艰苦险恶的环境磨砺照金精神

照金精神是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陕甘边地区和陕北地区创建西部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程度上具有特定地区性。照金四面环山，沟壑纵横，荆棘丛生，山势雄奇，地形险要。这里进可夺取渭北，威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退可据险固守，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活动区，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极端艰苦。他们不断进行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愿望。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在这里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游击队在极其险恶艰苦的条件下，组建了基层政权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多次摧毁了周围的反动民团据点，粉碎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同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3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4月初，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1933年春夏之交，照金苏区已成为纵横近百里、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

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锤炼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信仰、情操、胆略和意志。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种特殊的品格，这就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走自己的路。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照金苏区一次次走出危机，求得生存。

科学理论的引领升华照金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发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和革命兵变大都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党内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极力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大搞“城市中心论”，批评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犯了“流寇主义”“稍山主义”的错误等，排挤打击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领导，给根据地建设带来严重危机。身为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杜衡，主张打倒一切，因树敌过多，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薛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使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等6个县的民团，分路进攻照金苏区。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败仗，照金苏区岌岌可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总结经验教训，在陈家坡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观点，使革命回到了正确路线上。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定，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刘志丹、习仲勋、王泰吉等同志，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进行游击战的一系列策略、战略思想为指导，在远离党中央而不能得到及时指导的情况下，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实践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继续发展，也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体现，表现了伟大的创新精神。

照金精神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们党、军队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各具特色。照金苏区革命斗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烟云，但在照金苏区开辟过程中形成的照金精神，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时代光芒。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 王 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上，逐步形成了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格局。那么，怎么确保党委（党组）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呢？笔者认为，党委（党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发挥教育、管理、制度等综合效应，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思想层面：加强廉政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要使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得到全面落实，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提升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增强本领。因此，应加强对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的廉政教育。

管理层面：加强监督制约。党委（党组）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就必须选好用好干部，并切实加强管理和监督制约。应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的标准，规范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突出勤政廉政的风向标，真正使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党员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进入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另外，加强对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日常监督。

制度层面：加强责任追究。党委（党组）要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就必须加强责任追究，防止党委（党组）责任制流于形式，做到有责必究，有错必改。一是建立考评机制，二是建立奖惩机制，三是建立问责机制。

领导层面：构建组织体系。党委（党组）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还必须建立统一高效和运行顺畅的领导组织体系。一是建立齐抓共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格局。各级党委（党组）应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工作等中心工作一起部署、一起督查和一起考核，进一步靠实责任，明确任务，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通过建立各级党委（党组）之间的工作协调、信息反馈、情况通报、定期报告等组织管理体系，努力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负责、相关部门配合、党员群众参与和一级一级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发挥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应把建好班子、带好队伍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切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在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统筹规划、组织领导、制度设计、督促检查等方面给予重视支持。充分认识到主要负责人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上以身作则，带头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带头深入基层调研，带头解决实际问题，时时、处处、事事率先垂范、作出表率。

参考与建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主张

□ 陶元浩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提法，但却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并提出了基本主张。

确立党内平等与民主原则

作为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自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党内平等。184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章程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后来，恩格斯将这种平等界定为党内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即“我们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会员”，同时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民主是早期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成员均须“选举产生”。18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回顾总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组织内部的重要决定，也遵循民主原则会议讨论做出。党内平等和民主原则一直贯穿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此后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强调服从权威与加强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分工复杂化和联合活动导致组织起来成为必须，而组织起来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这就是他们所指出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针对党内存在的要求绝对民主和自治的声音，恩格斯专门写了《论权威》一文，明确指出绝对的民主和自治将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并最终致使革命失败，指出要辩证地看待权威和自治的关系，“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在不否认支部自治权的基础上，应将一部分权力委托给上级组织及至中央组织，否则党的整体性无法体现，因此必须“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结合起来”。之所以强调权威和集中，是因为它是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要使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指向同一方向，“没有权威和集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提出维护党内团结的辩证法

保持党内团结，是由政党的普遍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规律共同决定的。马克思将团结视为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只要我们巩固团结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这不仅是由党的远大理想和艰巨任务决定的，还是对过去无产阶级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马克思表示，过去存在的忽视兄弟般的团结，将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党内团结的“辩证法”，这在恩格斯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几次通信中得到充分表现。1773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指出，党内团结不能建立在一味妥协丧失原则的基础上，否则，“气泡”总有一天会破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1882年，恩格斯在信中进一步指出，“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这里共同指向了党内团结应是抛弃掩饰调和政策的团结，必须是“有原则”的团结。这里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民主促团结，“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另一个是以斗争和批评促团结，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只有实现了这个意义和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正正确的团结。

通过“加盐酸”和反对宗派保持党的纯洁和统一

保持党的纯洁和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优势和内在要求，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政党规模的扩大，党内成分日益复杂，“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思想纯洁和意志统一是重要课题。另一方面，随着队伍扩大和斗争形势复杂，党内宗派现象开始凸显，“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恃无恐”，如何保持党的组织纯洁和行动统一也是重大课题。

针对保证思想纯洁和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加盐酸”的方法来“熔化”各种非无产阶级分子。恩格斯认为促进“加盐酸”的过程，“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针对保证组织纯洁和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要反对宗派，1871年，马克思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在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同巴枯宁主义者等各类宗派进行了卓绝斗争，保持了党的统一。

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权威，发挥支部的基础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其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负责党章的审查和修订工作。党章的修订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思想。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拟定完毕，经过同盟各个支部和区部的充分讨论基础上提交半年后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并通过，而章程一旦经由代表大会通过，就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无论是总委员会或者是代表大会都不允许任何破坏我们章程的行为”。在第一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第五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本地的条例和规章，但是“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个支部都应在工人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同盟章程规定，三人以上至二十人的可以成立支部，支部每两周至少开会一次，支部与盟员之间至少每月联系一次，要经常性地向上级区部进行报告工作等等，这些思想和规定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起到重要指导和规范作用。

突出强调党的纪律，形成基本纪律规范和惩戒措施

纪律严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基因。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纪律的出发点，是由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决定的，这就是恩格斯给马克思信中写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规律显然是，到处都有一部分工人领袖必然要蜕化”。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不再前进甚至倒退。因此，就要求充分发挥党的纪律这一利器作用。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纪律规范，如遵循政治纲领、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抵制宗派行为和非组织活动，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党的集中，确定上下级的报告制度、开会制度和联系制度，等等。同时，强调必须对违反党的纪律行为进行惩戒，如同盟章程第八章专门就“反盟罪行”做出规定，“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而一旦被开除出盟，将“不得再接收入盟”，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严明党纪并认真执纪，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纪律保障，也为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风党纪